

吉林长白县干沟子墓地的文化性质 与相关问题

赵俊杰 马 健 金旭东

关键词：吉林 干沟子墓地 柳庭洞文化 积石墓 战国至西汉时期

KEYWORDS: Jilin Gangouzi Cemetery Liutingdong Culture Stone Cairn Burials Warring-States Period to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BSTRACT: Through the research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pottery, the paper considered that the appearance of the Gangouzi Culture is the result of the division of the Liutingdong Culture in the late Warring-States Period. In addition, the remains represented by Huangyujuan Zhushan M1 and the Tuanjie Culture in the same region are also the successors of Liutingdong Culture. The style of the stone cairn burials of the Gangouzi Cemetery would probably originate from the Lü shun-Dalian area; its appearance in the middle reach of Yalu River would b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orthward migration of the people of the Zhao State of the Warring-States Period, but the materials available to date are still not sufficient to indicate the diffusion route of the stone cairn burials from the middle to the lower reaches of Yalu River.

干沟子墓地位于吉林省长白县，南邻鸭绿江，为鸭绿江中游地区首次发现的积石墓群，1986年文物普查时测绘著录墓葬共19座^[1]。2001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勘察、测绘，发掘清理了其中的7座墓葬，并根据随葬品的时代特征，将其整体时代大致推定为战国晚期至西汉^[2]。由于墓地整体年代早于辽宁桓仁、吉林集安地区的高句丽早期积石墓，被视为我国东北地区积石墓葬发展演变过程中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而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本文拟结合墓地出土陶器的基本特征，分析该墓地的文化性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相关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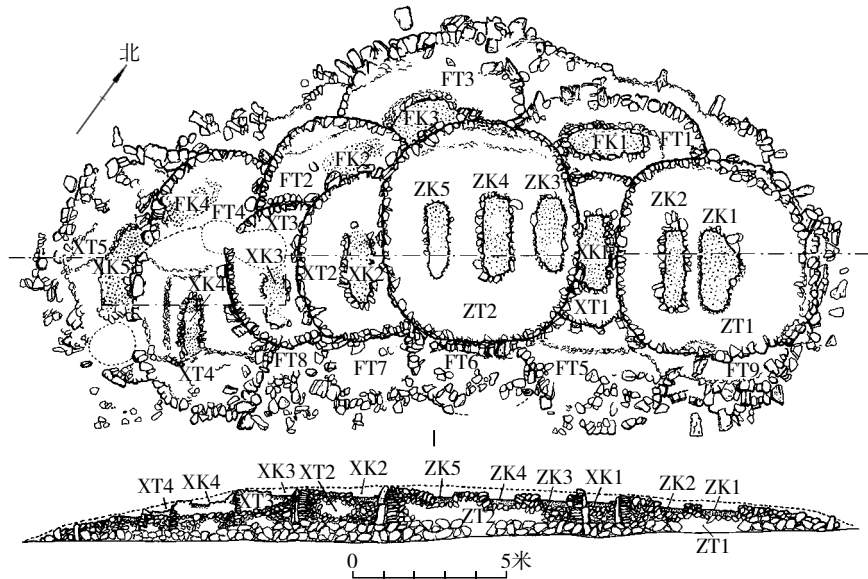
一、干沟子墓地的文化性质

干沟子墓地的墓葬是一种由几个或十几个墓坛接续而成的有坛积石墓。墓坛以大块河卵石垒砌，形状有圆形（主墓坛）、半圆形（续墓坛）和扇形（附墓坛）三种。墓坛顶部以体量稍小的河卵石构筑长方形或椭圆形的墓圪。主墓坛上一般有2~5个墓圪，续、附墓坛上一般只有1个墓圪。墓圪底部普遍铺小石子（图一）。人骨经火葬后直接置于墓圪内，其上以碎石封盖，无木质葬具。随葬器物有陶器、石器及铁器、铜器与铜钱，数量不多，种类亦较为单一。

作者：赵俊杰，长春市，130012，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马 健，长春市，130000，长春市文物保护研究所。

金旭东，长春市，130000，吉林省文物局。



图一 干沟子AM2平、剖面图

东北地区大量的发掘与调查结果表明，积石墓、石棺墓、大石盖墓等墓葬形态，以及火葬、多人多次葬，以小型陶明器、青铜器、管状或珠状装饰品等遗物随葬，并非某一考古学文化所独有，而是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内普遍采用的葬制。同一考古学文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葬制的变化，甚至在同一时期也存在不同的墓葬形态。另一方面，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中，陶器和石器作为实用器，是研究遗存文化性质的最重要依据。我们不否认石器在划分考古学文化上的意义，但“石器的种类和形式远不如陶器变化迅速而富于地域性差异，某种形式差别不大的石器往往存在于广大地域和漫长时期的许多种考古学文化中”^[3]。因此，在判断东北地区古代遗存的文化性质时，仍然要以对陶器形制特征和组合的考察为中心展开。

干沟子墓地出土陶器均为夹砂褐陶，素面，手制，器壁厚薄不均，造型不甚规整。器物形制较小，均为明器。简报将已发表的39件陶器统归为罐类，经观察似可进一步细分为罐、钵（碗）、杯（盅）三大类，按文化因素的不同可分为三组。

甲组陶器 32件。器形有筒形罐、钵

（碗）、杯（盅）。

筒形罐 14件。大口，深腹，平底。按腹部形态可分为斜腹（图二，1、2）与弧腹（图二，3、4）两型，分别对应简报所划分的A型与B型深腹罐。

钵（碗） 14件。多敛口，假圈足（个别为圈足）。按腹部形态亦可分为斜腹（图二，5、6）与弧腹（图二，7、8）两型，基本涵盖了简报所划分的A型与B型浅腹罐。

杯（盅） 4件。形制与钵（碗）相似，唯器形较小（图二，9、10）。其中，AM2XK1：1形似盅，因与杯功能相近，故暂将其划入杯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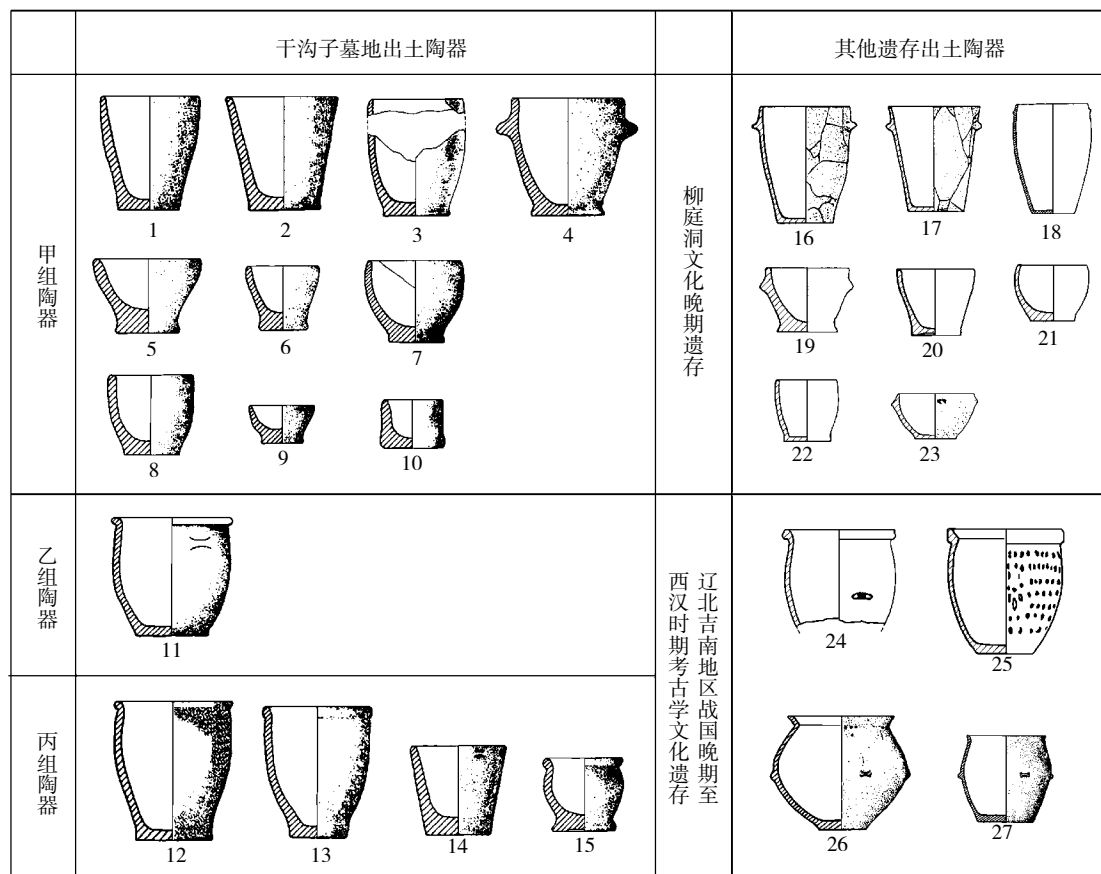
乙组陶器 2件。均为叠唇罐，弧腹，平底，即简报所划分的Cb型浅腹罐，其中1件上腹部有泥条状横耳（图二，11）。

丙组陶器 5件。器形有筒形罐、叠唇罐。

筒形罐 3件。AM1XK3：1、AM2ZK4：1（简报所划分的C型深腹罐），弧腹，叠唇不明显（图二，12、13）；BM4FK2：1，直腹，口沿部有一盲耳（图二，14）。

叠唇罐 2件。即简报所划分的Ca型浅腹罐，鼓腹。其中1件带圈足，另1件底部残缺（图二，15）。

甲组陶器占干沟子墓地出土陶器的绝大多数，以筒形罐、钵（碗）、杯（盅）为基本组合，个别陶器上腹部有对称的乳突形小耳，陶器组合与形制特征与分布于图们江流域的柳庭洞文化^[4]晚期遗存有较多的相似性，绝大多数器形都能在吉林琿春大六道沟^[5]、延吉新光^[6]、琿春北山^[7]、图们石砚^[8]等



图二 干沟子墓地及相关遗存出土陶器

1~4、12~14、16~18. 筒形罐 (BM2XK1:2、BM2FK8:1、AM3ZK2:1、BM2FK5:1、AM1XK3:1、AM2ZK4:1、BM4FK2:1、琿春大六道沟出土、琿春大六道沟出土、延吉新光F3:34) 5~8、19~23. 钵 (BM2ZK1:1、AM2FK1:1、BM2FK2:1、AM2XK2:2、琿春北山墓地T12①扩:1、延吉新光F3:9、延吉新光F3:3、琿春北山墓地M2:7、图们石砚出土) 9、10. 杯 (BM2ZK2:1、AM2XK1:1) 11、15、24、25. 叠唇罐 (BM2FK6:1、AM3ZK3:1、西丰永淳T0203②:1、西丰永淳M2:17) 26、27. 鼓腹罐 (东丰赵秋沟M2、M3出土)

遗址中的柳庭洞文化晚期遗存陶器中找到原型 (图二, 16~23)。我们认可发掘简报对于干沟子墓地时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的断代结论, 而柳庭洞文化晚期遗存的年代大致为战国时期^[9], 整体上早于干沟子墓地, 可见甲组陶器当来源于柳庭洞文化晚期遗存。

乙组陶器以罐口沿部叠唇与腹部贴饰泥条器耳为主要特征。从目前情况看, 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具有上述特征的陶器常见于东辽河、辉发河上游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中, 在吉林东丰赵秋沟^[10]、辽宁西丰永淳^[11]与抚顺莲花堡^[12]等遗址或墓地中均有出土 (图二, 24~27), 表明乙组陶器的源头应当在辽北

吉南地区。通化西江遗址乙组遗存^[13]中存在相当数量的叠唇罐, 显示出通化地区可能是此类陶器从源头向长白山腹地传播路径上的重要节点。

丙组陶器的基本形态与甲组陶器中的同类器相似, 但口沿部出现叠唇或贴饰盲耳, 显系前者受乙组陶器影响的产物。

基于以上分析, 我们认为干沟子墓地出土的绝大多数陶器与柳庭洞文化晚期陶器在形制与组合上具有明显的承传关系, 此类遗存应为柳庭洞文化晚期遗存的继承者之一, 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辽北吉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影响。

二、柳庭洞文化的流向与年代下限

柳庭洞文化是东北地区一支分布于长白山山东侧图们江流域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从目前的发现看,该文化以我国吉林延边地区与朝鲜咸镜北道东北部为核心分布区域,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南端也有零星分布。陶器以筒形腹为主要特征,器物组合主要是筒形罐、平底钵(盆)、假圈足碗与圈足豆等,石器以斧、刀、镞、矛为代表,青铜器极为罕见。赵宾福将柳庭洞文化陶器与该地区稍早时期的青铜时代文化——兴城文化陶器比较后指出,二者的陶器一脉相承,而且从早到晚的递进演变关系非常清楚,因此前者应由后者发展而来;又根据朝鲜咸镜北道会宁五洞遗址F6(陶器有乳突形小耳)打破F5(陶器无耳)的层位关系与许多房址、墓葬表现出的两组陶器很少共存的现象,将柳庭洞文化划分为早、晚两期,早期时代为西周早期至春秋晚期,晚期时代为战国时期。早期陶器的特点是素面、无耳,晚期陶器除了少数器形外,绝大多数器物的上腹部(近口沿处)有对称的乳突形小耳^[14]。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对柳庭洞文化的分布、面貌、分期与源头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对该文化流向与下限年代的考察还略显薄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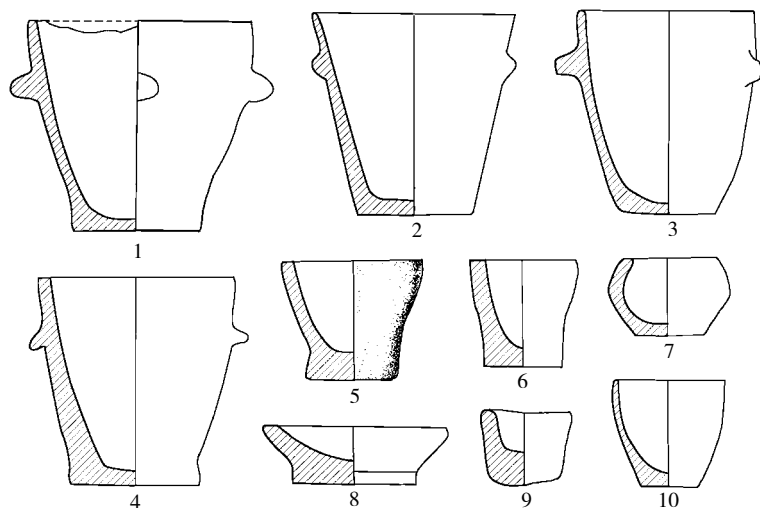
与柳庭洞文化晚期陶器相比,就主要文化因素而言,干沟子墓地的陶器(甲组)组合出现了一定的变化,不见敞口、斜腹的盆、钵,新出现直口的盅,在形制上也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一是几乎所有陶器的器底均明显内收(折曲)成假圈足或有假圈足的倾向,而柳庭洞文化晚期陶器中这种现象只存在于部分碗、钵类器物中。二是上腹部饰对称乳突形小耳的陶器急剧减少,已发掘的墓葬仅出土1件(见图二,4)。这些陶器的新特征为探寻柳庭洞文化的流向提供了重要线索。

学界已经注意到,发现于吉长地区、以舒兰黄鱼圈珠山M1^[15]为代表的后西团山文化遗存与柳庭洞文化晚期遗存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乔梁认为,如果将外来因素剔除,黄鱼圈珠山M1这类遗存表现在陶器上最恒定的因素只有筒腹斜壁附瘤状耳的罐、杯一类器物。进入青铜时代之后,东北地区筒形罐系统的陶器在大多数地区走向衰退,而只在长白山地及其邻近地区保持着发展的势头,因此此类遗存的源头可能要在长白山地一带寻找^[16]。后来的研究则更为直接地将此类遗存视作柳庭洞文化晚期遗存的孑遗^[17],对此我们深表赞同。将干沟子甲组陶器与黄鱼圈珠山M1类型陶器相比较后就可以发现,二者在器物组合和形制特征上有很高的相似度,只不过后者的陶器群中饰对称乳突耳(瘤耳)者所占比重要高于前者(图三),这也进一步证实了黄鱼圈珠山M1类型遗存源于柳庭洞文化晚期遗存的推断。在之前的认识基础上,我们曾以陶器形制特征与组合为中心,重新界定了“黄鱼圈珠山M1类型”遗存的内涵,并根据层位关系与出土遗物的时代特征将此类遗存的整体时代推定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18]。既然干沟子遗存与黄鱼圈珠山M1类型遗存的年代上限都为战国晚期,且又都直接源于柳庭洞文化晚期遗存,那么后者的年代下限或可晚到战国晚期。

除以上两类遗存外,一般认为分布地域与柳庭洞文化相近、时代为两汉时期的团结文化也应该是柳庭洞文化的继承者之一。因此就目前情况而言,柳庭洞文化的流向可分成三支,除在当地演化为团结文化外,有一支迁移至第二松花江流域形成黄鱼圈珠山M1类型遗存,还有一支则南下到鸭绿江中游形成干沟子遗存。

三、柳庭洞文化末期的社会变化

如果说第二松花江流域以黄鱼圈珠山M1



图三 黄鱼圈珠山M1类型陶器

1~4. 筒形罐（九台石砬山墓地采集、桦甸西荒山M4：18、九台关马山M1：1、黄鱼圈珠山M1：1） 5~7、10. 钵（东丰龙头山M1出土、九台石砬山墓地采集、九台石砬山墓地采集、九台关马山M1：2） 8. 盘（公主岭猴石古墓出土） 9. 盅（公主岭猴石古墓出土）

为代表的遗存的发现，表明图们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柳庭洞文化）在其发展的高峰时期也曾对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19]，那么干沟子遗存在鸭绿江中游地区的出现，似乎也可视为同样的结果。但从普遍意义上讲，考古学文化本体发展的高峰期至少应具有在一定区域内遗址数量（密度）增长、分布范围扩大、遗物种类与数量增加等基本特征。与柳庭洞文化早期遗存相比，柳庭洞文化晚期遗存的代表遗址（或代表单位）在分布范围与数量上并没有太大差异，仅遗物的数量和种类略有增多。这种现象表明，柳庭洞文化晚期的生产力水平确实较早期有所提升，但幅度有限。在生产工具并没有明显改进、生业方式也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生产力提升的内在推动力很可能是聚落内人口的增长。总体而言，柳庭洞文化陶器种类相对单一，较多地使用石器，青铜制品发现极少，是一支较为落后的考古学文化。聚落人口的增长固然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提升生产力水平，但一旦其增长的速率过快，而同时食物的生产又不能满足增长人口的需求，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加剧社会的不安定和人口集团的分

裂，最终导致柳庭洞文化在战国晚期的衰落。

另一方面，黄鱼圈珠山M1类型遗存的代表遗迹与干沟子遗存呈明显的点状零星分布特征，文化面貌与周边遗存判然有别，且目前经发掘的遗迹均为墓葬，尚未确认周边遗址与墓葬的关联性，又区别于同时期燕文化以构筑大型中心聚落（城）深入异民族文化区的扩张方式。因此，我们认为以黄鱼圈珠山M1类型遗存与干沟子遗存为代表的遗存在图们

江流域以外地区的出现，并非柳庭洞文化发展到高峰阶段主动向外扩张的产物，而是战国晚期该文化晚期遗存分裂的结果。也正因如此，这二者特别是黄鱼圈珠山M1类型遗存具有很强的流动性，我们曾以零散分布的墓葬为节点，大致勾勒出这类遗存所代表的人群从柳庭洞文化晚期社会中分裂出来后的迁移路径^[20]。干沟子遗存所代表的人群从图们江流域出发后，很可能选择向西南方向沿长白山脉东侧行进，到达长白县干沟子（图四），而干沟子墓地墓坛的不断接续则暗示这里曾存在过定居时间较长的社会。囿于材料，这支人群此后是否再次迁徙尚不得而知。

此外，团结文化的分布范围也能为柳庭洞文化的分裂提供旁证。团结文化被认为是柳庭洞文化的本地继承者。历年的调查与发掘表明，在图们江流域虽然发现了不少团结文化的遗存，但其中心分布区却位于绥芬河流域，较之柳庭洞文化明显偏于东北。这种现象提示，战国晚期图们江流域或许曾发生过剧烈的社会动荡，导致当地原生文化中心区北移，其直接表现便是柳庭洞文化的分裂与衰落。



图四 柳庭洞文化的流向及其所代表人群的动向示意图

四、鸭绿江流域积石墓的渊源及其传播路径

干沟子积石墓是鸭绿江流域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积石墓，整体年代晚于旅大地区的岗上积石墓，早于集安一带的高句丽早期积石墓。岗上积石墓为平地起建，无墓坛，墓圪多呈放射线状分布，中心墓圪底部有铺石^[21]；而无坛的圆丘状积石墓则可能是高句丽最早的积石墓类型之一。二者的形制与干沟子积石墓既有相似之处，又有诸多差异。李新全曾提出干沟子积石墓是将旅大地区积石墓与高句丽积石墓连接的中间阶段的观点^[22]，颇有启发意义，但论据尚显不足。因此，探索东北东部地区积石墓的传播路径已成为当务之急。

大约从战国晚期开始，东北地区诸多土著文化的陶器中开始不约而同地出现中原汉文化常见的豆一类器物，固有的陶器群中的部分器物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底部内收成假圈足或圈足的现象，显示出此时期汉文化对于东北地区的影响和辐射开始逐步增强。这种汉文化因素的渗透可能存在两种模式：在东北西部地区主要体现在以燕文化为代表的势力的扩张，以及

当地或邻近地区土著文化与燕文化主动或被动的交流；在东北东部地区则似乎更多地依靠了躲避战乱而迁入的中原流民。正史中关于当时汉人流民的所属国别与动向有不少记载。《史记·朝鲜列传》载：

“汉兴……复修辽东故塞，至泅水为界，属燕……满亡命，聚党千余人，魁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泅水……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后汉书·东夷列传》“濊”条：“汉初大乱，燕、赵、齐人往（朝鲜）避地者数万口”。由文献记载可知，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导致的战乱使得故燕、赵、齐地的汉人大规模出逃朝鲜。然而问题在于文献叙述的时间为秦末汉初，卫满亡命朝鲜后在当地纠集的汉人必有许多是此前就已经流亡至朝鲜半岛的，而且朝鲜半岛也并非汉人流民的唯一目的地。集安阳岔高台村赵国安阳君青铜短剑^[23]、长白八道沟蔺相如铜戈^[24]以及铜钱的发现，尽管不能排除文化交流或贸易的可能，但我们仍然倾向于认为战国晚期就已经有汉人移民到达鸭绿江中游地区，而其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赵地。关于移民的迁徙路径文献失载，但零星的考古发现依然提供了些许端绪。

以往曾有旅大地区出土赵国铭铜剑^[25]的报道，集安五道沟门岭积石墓^[26]出土青铜器中的部分器形与旅大地区出土的同类遗物相似，在对长白县二十一道沟积坛调查中也发现中原系青铜器^[27]，或许可暂将上述三地的考古发现视为汉人移动路径上的节点。从

内陆前往旅大地区无外乎两条线路：其一为陆路，须借道燕国；其二则为海路。《史记·赵世家》载：“（悼襄王四年）……攻齐，取饶安”。关于饶安之所在，此条纪事下《集解》云：“徐广曰：‘在渤海’”，《正义》曰：“饶安，沧州县也”。最近有研究者认为饶安为河北省盐山县西南旧县^[28]，而盐山东临渤海，因此，至迟在赵悼襄王四年（公元前241年），赵国的东疆已经进抵渤海之滨，那么战国晚期赵人为避兵祸选择浮海前往辽东的可能性较之陆路便大大增加了。关于移民在抵达旅大地区后，途经鸭绿江下游的集安辗转到达鸭绿江中游的长白县一带的行进线路，目前尚缺乏有力的证据来说明，可尝试将其分为旅大-集安与集安-长白两段，后一段路线可溯鸭绿江而上，应当问题不大；至于前一段路线，参考数百年后渤海朝贡道的走向，似可大略得之^[29]。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试图勾勒出一条战国晚期汉人移民从旅大地区向鸭绿江中游一带移动的轨迹，而近乎同时，原来仅见于旅大地区的积石墓也突然出现在同一地区，这显然不是巧合，前述蒯相如铜戈的原始埋藏环境为探讨二者的联系提供了切入点。据村民介绍，铜戈出土于一个东西长45米、高低不等的石堆中，以前为了建房、垒梯田取石时，在石堆中曾发现腐朽的尸骨、石镞和陶片^[30]。种种迹象显示，该石堆很可能是一座形似干沟子墓葬的积石墓。蒯相如为战国时期名相，此铭文铜戈很可能是赵国贵族之物，虽然目前尚不能遽断墓主的身份，但至少表明其与来自赵地的汉人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前所述，柳庭洞文化是一支相对比较落后的考古学文化，作为继承者之一的黄鱼圈珠山M1类型遗存在保留核心陶器组合的前提下，已经表现出迁徙过程中不断吸收先进文化因素、逐渐改变墓葬形态的特征。干沟子遗存的情况与之非常相似，其所代表的人群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接受并采用了积

石墓作为死后的埋葬方式。因此，我们认为以长白干沟子为代表的积石墓当源于旅大地区，其在鸭绿江中游地区的出现与战国晚期流民从旅大地区向长白山腹地迁徙有直接关联。但是，积石墓为旅大地区土著文化的墓葬形式，是汉人在迁徙过程中认同并采用了这种墓葬形式，还是移民潮中有大量旅大地区的土著居民跟随汉人一同北上，抑或是土著居民为躲避汉人流民对其原有稳定的生活状态的威胁而先行向东北腹地移居，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五、余 论

以上本文基于陶器的视角考察了干沟子遗存的文化性质，指出这类遗存在鸭绿江中游的出现是战国晚期图们江流域柳庭洞文化分裂的产物，并依据零星的考古发现试图探讨此时期鸭绿江流域积石墓的出现与汉人移民集团北上之间的内在联系。

汉人集团在到达鸭绿江中游以后，似乎并没有停止北上的脚步。柳庭洞文化晚期遗存中已经出现了一定数量的陶豆，至团结文化阶段，豆已经成为主要器类之一，器形也趋于多样化，表明汉文化可能沿着长白山东侧的通道，途经图们江流域一直向北传播到绥芬河流域，随着陆路距离的不断增加，汉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也逐渐减弱。不过，《后汉书·东夷列传》“北沃沮”条“其耆老言，尝于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的记载，却提示了汉文化经由朝鲜半岛从海路前往绥芬河流域的可能。

另一方面，从本文的结论看，人群的行进路线先经集安，后到长白，尽管干沟子积石墓的整体时代稍早于桓仁、集安的积石墓，目前也只能谨慎地认为在墓葬形态上前者可能早于后者，而并不能确认二者间存在谱系关系，从而以点代面地推定积石墓的传播存在由鸭绿江中游向下游的路径。我们期待今后桓仁、集安及其周边地区更早形态积石墓的发现。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项目批准号：10&ZD085）与吉林大学基本业务费项目（项目号：2011QG006）的研究成果。

注 释

- [1]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文物志》第二章第三节干沟子墓群条目。
- [2]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长白县干沟子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8期。
- [3] 林沅：《论团结文化》，《北方文物》1985年第2期。
- [4] 此类遗存是一支主要分布于图们江中下游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存，林沅首先将其定名为“柳庭洞类型”（《论团结文化》，《北方文物》1985年第2期），赵宾福进一步论证了该遗存的特征、分期、年代和分布，并将其改称为“柳庭洞文化”（《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
- [5] 刘振华：《吉林省原始文化中的几种新石器时代遗存》，《博物馆研究》1982年第1期。
- [6] 吉林汪延公路考古队：《吉林省延吉市新光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7期。
- [7] 图珲铁路考古发掘队：《吉林珲春市河西北山墓地发掘》，《考古》1994年第5期。
- [8] 侯莉闽、朴润武：《吉林省图们石砚原始社会墓地的调查与清理》，《博物馆研究》1995年第2期。
- [9] 赵宾福：《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第260~262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
- [10] 金旭东：《1987年吉林东丰满南部盖石墓调查与清理》，《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2期。
- [1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铁岭市博物馆、西丰县文物管理所：《辽宁西丰县永淳遗址及墓地的发掘》，《考古》2011年第3期。
- [12] 王增新：《辽宁抚顺市莲花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6期。
- [13] 金旭东、何明：《1990年吉林省通化县南部考古调查试掘的主要收获》，《北方文物》1994年第3期。
- [14] 同[9]，第291、257~262页。
- [15]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舒兰黄鱼圈珠山遗址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4期。
- [16] 乔梁：《吉长地区西团山文化之后的几种古代遗存》，《辽海文物学刊》1993年第2期。
- [17] 同[9]，第261、262页。
- [18] 金旭东、赵俊杰、吕斌：《“黄鱼圈珠山M1”类型遗存再辨析》，见《边疆考古研究》第10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
- [19] 赵宾福：《图们江流域的青铜时代文化研究》，《考古》2008年第6期。
- [20] 同[18]。
-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双砣子与岗上——辽东史前文化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6年。
- [22] 李新全：《辽东地区积石墓的演变》，《东北史地》2009年第1期。
- [23] 集安县文物保管所：《吉林集安县发现赵国青铜短剑》，《考古》1982年第6期。
- [24]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吉林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发现商相如铜戈》，《文物》1998年第5期。
- [25] 旅顺博物馆报道组：《旅大地区发现赵国铜剑》，《考古》1973年第6期。
- [26] 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发现青铜短剑墓》，《考古》1981年第5期。
- [27] 张福有、孙仁杰、迟勇：《长白山南麓积坛调查清理与考证》，《东北史地》2007年第1期。
- [28] 周振鹤、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先秦卷》第49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 [29] 《新唐书·地理志》中这样叙述渤海朝贡道：“登州东北海行，过大谢岛、龟歆岛、末岛、乌湖岛三百里。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都里镇二百里。东傍海靛，过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囊驼湾、乌骨江八百里……自鸭绿江口舟行百余里，乃小舫泝流东北三十里至泊沟口，得渤海之境。又泝流五百里，至丸都城，故高丽王都……”。具体考证参照吴承志：《唐贾耽记边州入四夷道里考释》卷二，文物出版社，1987年；魏存成：《渤海考古》第137、138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 [30] 同[24]。

（责任编辑 洪石）

本期要览

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南壕沟发掘简报 2013年对西坡遗址的南部壕沟进行了发掘。壕沟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口部较宽,两侧斜收,近底部折收为小平台。壕沟内填满不同形状和性质的堆积,还发现灰坑、完整猪骨等遗迹,堆积年代应始于西坡遗址庙底沟类型遗存早、中期,延续至晚期。壕沟的堆积过程大致分为五个阶段,基本上与西坡聚落形态的演变相对应。

福建长泰县龙津溪中游商周时期石器制造场 2010年在福建长泰县境内龙津溪中游发掘了四处商周时期浮滨文化的石器制造场遗址。其中后厝山遗址保存最好,石制品堆积内涵单一,应为石器初级加工营地。该遗址群的发掘与整理,为浮滨文化石器制作工艺的复原研究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对探讨商周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石器生产与交易方式也有重要学术意义。

河南安阳市明代墓葬发掘简报 近年在殷墟范围内陆续发掘了一批明代墓葬。其中王裕口南地M155为斜坡墓道长方形砖室墓,是明代汝源端僖王朱厚焞夫妇合葬墓。豫北纱厂M33、M34均为斜坡墓道土圹墓,保存较好,属于明代汉中守备副使张士隆的家族墓。这三座明墓的发现,为研究安阳地区明代藩王和官吏的葬制、葬俗及家族史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二里头遗址制骨遗存的考察 二里头遗址至少发现两处制骨作坊,年代属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至第四期。作坊以半地穴式房屋为核心,周围分布有相关遗迹。骨、角器多选用黄牛骨骼和鹿科动物角制作,采用片状工具切割截取,应该已使用铜质工具,工艺流程较为规范。二里头遗址制骨手工业已相当成熟,但与二里冈文化及殷墟时期相比,专业化程度相对较低。

吉林长白县干沟子墓地的文化性质与相关问题 通过以陶器为主要视角的比较研究,推断干沟子遗存的出现是战国晚期柳庭洞文化分裂的结果。除此之外,黄鱼圈珠山M1类型遗存与图们江流域的团结文化也是柳庭洞文化的继承者。干沟子积石墓的形态应当源于旅大地区,其在鸭绿江中游地区的出现与以赵地汉人为代表的人群从旅大地区向北迁徙密切相关。